

宽 容 与 交 流

—记十八世纪东西方学术讨论会

高 翔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日至六日，十八世纪东西方学术讨论会在荷兰人类学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NIAS)举行，这次会议由国际十八世纪研究会倡议、主办，会议主席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罗伯特·达恩(Robert Darnton)。

十八世纪东西方学术讨论会此前已召开数次，均在夏季举行，会议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参加者必须是具有博士学位或同等学历的青年学者；二是参加人员有地区限制，即必须来自原苏联、东欧以及西欧、北美等地区，也就是说，东西方学术讨论会实际上是东西方研究十八世纪的青年史学家的一次学术聚会。

九三年度东西方学术讨论会正式参加者有二十二名，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比利时、法国、德国、加拿大、中国、俄罗斯、保加利亚、乌克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波兰等十六个国家。会议规模虽小，但颇具“国际性”，在正式开会期间，一些荷兰学者也前来旁听，甚至参加讨论。会议主题是：十八世纪的宽容与迫害。

宽容与迫害，是一个古老而又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学术命题(当然，它首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社会现象)，围绕这一主题，学者们提交了各具特色的学术论文。加拿大学者威廉·魏克(William Walker)分析了启蒙运动时期著名思想家洛克的宽容学说，如果宽容的界定，适用范围及其局限等，英国学者S·凯莎(Sean O'Cathasaigh)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指出：洛克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宽容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对非宽容行为的宽容不但是毫无意义的，而且可能是极为有害的。宽容，并非仅仅是道义的必须，而且是由具备相同心态的人们达成的契约所产生的一种道德结构。美国学者杰弗雷·拉韦尔(Jeffery S. Ravel)介绍了十八世纪法国戏剧界反对迫害的情况。在法国，演员长期受到社会 and 政府的歧视(这和中国传统社会演员及艺人地位低下，甚至横遭迫害的情形颇为相似)，他们不能享受大多数法国人所享有的宗教和世俗权利。从1680年到1789年，在巴黎演出的法国戏剧院的演员均被革除教籍，剧院男女演员不能合法结婚，女演员所生后代的合法性也不能得到社会和政府的承认。演员，除非他生前宣布放弃演出职业，否则，死后不能以宗教仪式安葬。这种极不公平的社会待遇在十八世纪后期引起了法国戏剧界的强烈反抗。吉弗雷在文中考察了这一反抗运动的代表人物——著名女演员米勒·克莱伦的事迹，分析了当时法国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启蒙思想家、作家以及政界、宗教界的反映，揭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这篇文章属于社会史研究范畴，在方法上，通过对演员待遇这一小小事件的分析，展现当时社会变革的大场面，立意新颖，视角独特，值得中国学者借鉴。阿尔巴尼亚学者艾利拉·克拉(Elira Cela)、保加利亚学者罗西查·格拉德娃(Rossitsa Gradeva)分别撰文考察了十八世纪巴尔干半岛的社会状况，尤其是政府机构、伊斯兰教组织和信仰基督教群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理解当前巴尔干地区尖锐的民族矛盾和动荡的政治局面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撰文分析十八世纪德国、俄罗斯、波兰等国社会状况，限于篇幅，这

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无是在会上的正式讨论中，还是在会下的个别交谈中，学者们都显示出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浓厚兴趣。中国学者向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有《文字狱与十八世纪中国知识界》，主要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控制、封建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复杂关系、康雍乾时代文字狱产生的原因及其基本状况、清廷高压统治对知识阶层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及学术活动的影响等。这篇文章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作为长期从事欧美历史研究的学者，他们过去在涉及到中国历史问题时，许多人下意识地受一些著名启蒙思想(如伏尔泰)的影响，过分强调中国传统政治的合理性(如比较完善的官僚政治体制。相对平等的科举考试、规模庞大的灾荒赈济，康雍乾时期中国空间强盛的国内形势等)，而对专制统治的另一面——严密的思想控制，对异端的残酷镇压等注重不够(当然，对中国传统政治、历史文化进行全盘否定者，在欧美学术界也并非绝无其人，但他们未出席本次会议)，故而中国学者的这篇论文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文化震惊”，纷纷发表意见，认为有必要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康雍乾时期的中国历史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研究不是否定中国文化，而是以理性的态度，以科学的方法，对这一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伟大文明进行更客观、更公正的认识。以前的世界史大多以欧美为中心，对中国只是进行肤浅而片面的描述，其实，没有中国历史的世界史不可能是一部真正的世界史，不懂得中华文明，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人类之命运(当然，仅认识中华文明，也不可能真正把握人类之命运)。在讨论及交谈中，学者们还对明清时期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欧洲宗教在中国得以传播的原因(尤其是文化原因)，清帝国内部的民族关系、伊斯兰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近三百年中国与欧洲的贸易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八月六日，大会闭幕，罗伯特·达恩作了总结性发言，对各国学者提交的论文，彼此间富有启发性的学术交流作出了高度评介。此后，来自东方的学者在荷兰作为期三到四周的学术参观、访问。八月九日，学者们访问了荷兰国家档案馆和皇家图书馆。荷兰国家档案馆珍藏着大量珍贵资料，其中，有关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材料尤为丰富，有的还有实物。笔者随手翻阅一个卷宗，里里有关于广州手工业生产的档案，并附有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的样品，色彩绚丽，用手轻抚，倍感质地精良。此外，还有大量图案，详细描绘了从中国进口瓷器的种类、大小以及样式。显然，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对了解清代外贸、东南沿海手工业生产、商品经济以及社会状况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我们的历史学者中，极少有人懂得荷兰文，以致这批珍贵材料在中国史研究中至今没有得到很好利用。至于荷兰皇家图书馆，虽是一座现代化的建筑，却珍藏着几个世纪以来的许多重要历史文献，也是荷兰全国图书资料检索中心。

莱登大学是一座著名高等学府，自然也是学者们乐于访问的学术机构。该校汉学研究院是欧洲汉学的中心之一，科研力量雄厚，每年都有大量论文，专著问世。汉学研究院图书馆收藏了不少中国古籍，台湾及香港出版的有关清史的资料与论著，而中国大陆出版的史学论著，历史资料，收藏却相对薄弱，有关中国历史的西文书籍(包括史料与研究著作)，该馆收藏尤其丰富，可以说这是该图书馆的重要特色之一。

值得特别介绍的是这次会议的东道主——荷兰人类与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NIAS)，该院创设于1970年，座落于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的渥森纳(Wassenaar)，距海牙和莱登都很近。严格说来，NIAS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科研机构，而是为荷兰及其他国家学者提供一个进修与研究的场所，即提供“一年的思考机会”。进入NIAS从事研究的都是经过挑选的对学术发展作出贡献的专家和学者。而研究院完善的设施，热情的服务，安静、优雅的自然环境则为他们进

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科研成果，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近乎完美的客观条件。近年来，NIAS 加强了与波兰、中国等东方国家的联系，据称，九二年曾有中国大陆学者入院从事短期学术研究。

在学术访问期间，来自东方的学者还参观了荷兰主要历史名胜和博物馆，位于哈勒姆(Haarlem)的特勒博物馆(the Teyler Museum)是荷兰最早的公众博物馆，它以其宏伟构造，丰富收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该博物馆陈列着荷兰历史上大量艺术和科学珍品，如发现的化石、矿物质以及古画、钱币、徽章和各种科学仪器、机械制造等。科学仪器陈列非常丰富，种类繁多，这些仪器虽然大多制造于数百年前，但设计严谨，制造精良，有的至今仍能使用，这与同时期中国保守的社会风气、落后的科学技术形成强烈对比，抚今追昔，不仅使人感慨万千。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在荷兰期间，尤其是在正式的学术讨论会上，有的学者曾提出应该给“宽容”下一个普遍有效的定义，以作为人们对历史和社会进行评判的理论依据。然而，每个人都从自己历史的、文化的立场理解“宽容”，从自己的或民族的利益出发论证“宽容”，各持己见，众说纷纭，最终没有达成共识。“我们因为不懂宽容才来到这里”，最后，在这个问题上却空手而归，也许，有的人会感到遗憾。然而，在我看来应该感到庆幸，没有给“宽容”下一个普遍有效的定义本身，正体现了“宽容”特有的本质和风格。